

# 两大济公故事群的形成及原因

吕 堃

(天津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 天津 300387)

[摘 要] 济公故事时间上从南宋到民国, 地域上从杭州到京津。不过京津济公故事并非杭州济公故事的延续, 而是重新构建了新的故事群, 从佛教色彩浓厚的传说变为公案侠义神怪杂糅的小说。两大故事群的形成与时代、地域、文学自身、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有关。

[关键词] 佛教; 济公故事; 地域传播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1)04-0147-04

济公故事从一篇济颠的舍利铭发展到上千回的济公小说, 并非理想状态的均质文本, 而是先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南北两个故事群。一者, 以杭州为中心向江浙乃至福建等南方地区辐射, 作品以《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醉菩提》、《醉菩提》传奇、《鞠头陀全传》为代表, 另一者, 以北京为中心向天津等北方地区辐射, 以《评演济公传》及诸多续书为代表。上海的出版商在济公小说的出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分析两大故事群的形成及原因, 对济公故事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一、杭州济公故事

有关济公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南宋释居简《北磻文集》卷十中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作于1209年道济圆寂后, 其中有关道济生平的内容如下: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 不用闾维法者, 故未之见。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 未之知也。叟, 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远孙, 受辞于灵隐佛海禅师, 狂而疎, 介而洁, 着语不刊削, 要未尽合准绳, 往往超诣, 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 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 题墨尤雋永。暑寒无完衣, 予之, 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 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 无故强之, 不往。……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 藏于双岩之下。<sup>[1]</sup>

这篇铭文中有关道济的信息主要包括: 道济的出身、性格、行为方式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道济喜欢喝酒, 二是道济圆寂火化时出现了晶莹的舍利, 由此道济被认为是得道高僧, 舍利信仰成为了济公信仰的端倪。因为是“邦人分舍利, 藏于双岩之下”, 那么, 济公信仰最初很可能是流传于杭州地区民间, 而非杭州僧团。随着济公信仰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 杭州的佛教僧团也不能再漠视济公故事了, 加上出于自神其教的目的, 僧团开始接受济公故事并且进一步给予附会。在济公圆寂后不久, 佛教典籍中陆续出现了有关济公的文字记载。宋代《如净和尚语录》卷下有诗“济颠”一首<sup>[2]</sup>, 其中“天台山里五百牛, 跳出颠狂者一头”一句, “五百牛”即指五百罗汉, 这是济公被僧团认定为罗汉的最早记载。《破庵和尚语录》法语中有“戢庵居士请赞济颠”一篇<sup>[3]</sup>, 说济颠为: “瞎堂之子, 附马之后。”《运庵和尚语录》赞佛祖有“济颠书记”一篇,<sup>[4]</sup>将济颠的活动范围从《湖隐方圆叟舍利铭》中“信脚半天下”具体到杭州地区, 并且称济颠为“贼”, 这是一个颇具禅意的称呼。

元代叟端禅师《慧文正辩佛日普照元叟端禅师语录》卷八有“济颠灵迹甚异”之语。<sup>[5]</sup>虽然他对济颠灵迹的具体内容没有记录, 不过至少可知, 至元代济公故事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神通了。元代编年体佛教通史《历朝释氏资鉴》卷第十一中有一大段对济颠的记载。<sup>[6]</sup>其中“天台李文和都尉”明确了之前佛教文献中提到的“驸马”身份, 并以职务称济颠为“济书记”, 还记录了济颠的三首诗, 反映济书记的文

[收稿日期] 2010-10-30

[作者简介] 吕堃(1980-)女, 辽宁抚顺人, 讲师, 博士, 从事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才。这三首诗中“供状”的内容在后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除有细微的改动外，基本被沿用。

济公故事除了向僧团传播外，也向文人阶层传播。明代最早涉及济公故事的文献为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卷十一济公为尼姑庵写铸钟疏头的故事：

僧济颠杭州净慈寺有僧名济颠，平昔于街坊上好打斤斗，语言无度或言偈语有深旨。尝见尼僧化钟求偈，云：“师姑铸钟，有铁无铜。若要铸钟，连松世松。”持与人看，皆谓之绝倒。谓尼曰：“汝癡嘲调也。”铸钟亦不成。逾年有木商因随喜到尼庵，见铜破，问尼何不重铸。答曰：“先年欲铸，因癡济颠老师相戏，故已之至于今未成。”乃索其疏，观之。遂知二商名王连松张世松，二人乐共施成之。<sup>[7]</sup>

沈家世代隐居于吴门（苏州），因而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记录的济公故事很有可能是当时苏州一带的传闻。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记载：

济颠者，本名道济，风狂不飭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也，故称济颠。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呜呼！此其所以济颠也耶？今寺中尚塑其像。<sup>[8]</sup>

这里提到了济颠被灵隐寺僧众讨厌而驱逐到净慈寺和济颠为人诵经下火有灵验等故事。

明代逐渐丰富的济公故事在杭州民间也很受欢迎，被民间说唱文学“陶真”所吸纳。《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中载：

杭州男女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sup>[8]</sup>

济颠陶真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了，不过陶真中的“红莲”、“柳翠”故事流传了下来，保存在小说和戏曲当中，讲述的都是和尚与妓女的故事。Meir Shaha认为：“这种和尚与妓女的故事模式很有可能影响了早期的济公传说，因为不同的陶真故事往往由相同的民间陶真说唱艺人来表演，那么杭州和尚济颠陶真故事有可能与“红莲”、“柳翠”故事属于同类型。”<sup>[9]</sup>明代嘉靖辛丑进士晁璠其家藏书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登录一本《红倩难济颠》<sup>[10]</sup>，据 Meir Shaha的结论推断，《红倩难济颠》很有可能是关于济公与妓女红倩缠绵之事。在隆庆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中，有一处描写济公与沈五官在新街刘行首家宿娼的情节，济公被妓缠得酒醒，溜出妓馆，在春台畔大火箱上睡了一夜。这段情节很可能就是《红倩难济颠》话本的内容。几乎与《宝文堂书目》“红倩难济颠”同时，杭州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一诗文类有一篇《济颠化缘疏》记：“有传记一本流于世，又有小石像于净慈罗汉堂。”<sup>[11]</sup>那么，济公故事在嘉靖年间已经很多了，并且出现了一本有关济颠的传记。

隆庆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为目前所见最早济公小说，首页注有“仁和沈孟梓述”，这“述”字可能暗示了一种口语与文字的中介。济颠口头文学“平话”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其内容应该与沈孟梓所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大体一致。隆庆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的基本情节单元为58个，故事进一步扩充。之后的《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二十回《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南屏醉迹》、《鞠头陀新本济公全传》以及《醉菩提》传奇的情节大部分或部分都借鉴了《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 二、北京济公故事

清中期到民国的济公故事源起于北京，主要包括济公传鼓词、济公传评书、郭小亭《评演济公传》以及大量续书。其中以郭小亭《评演济公传》为代表。

最晚在19世纪中期的北京地区，济公成为鼓词这种口头文学的热门话题。<sup>①</sup>鼓词像大部分口头文学一样，在明清时得不到尊重，甚至在20世纪以前鼓词并不被刊行，所以对济公故事感兴趣的业余表演者不得不以手抄本来满足读者的需求。Meir Shaha在《Crazy J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第二章第三节提到：济公两部手抄本鼓词均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有一部是完整本的抄本，共110卷，收录在《清车王府藏曲本》中，还有一部是仅仅有20卷残本的抄本（此本与傅斯年图书馆二十册《济公传》鼓词为一本），从34卷到53卷，收录在台湾的《俗曲集》中。从鼓词的封印可知，手抄本济公鼓词由至少三个店租赁和在另外一个店出售，那么济公鼓词的口头表演很可能在抄本以前就相当流行了。

清中后期口头济公故事除了济公传鼓词外，还有济公传评书。《江湖丛谈》“评书界之刘继业”中记载，说济公传的艺人，行话叫“串花”。因为“串花”是评书界的侃儿，北平俗语呼乞丐为花子，而济公传

① 傅斯年图书馆藏编号为五三九八九~五四〇〇八的《济公传》鼓词抄本为咸丰九年（1859）之前的说唱鼓词。

中的主角济公，形如乞丐。济公传说得好的艺人，有“一声雷陈胜芳”、张霁然、评书大王双厚坪、刘继业等人。<sup>[12]</sup>济公在评书界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话题，即使在评书界的事业面临破产的时候，馆里的角色大有更动，但是“冬腊月刘继业说济公传”没有改变。

《评演济公传序》说：“余友张孝廉文海，本钱塘名士，以游学京师，公余之暇，偶于稠人广众之区，见有谈是书之事者，一时脍炙人口，听者忘倦，及购诸坊本皆无。”<sup>[13]</sup>于是他们才请郭小亭著《评演济公传》。在《评演济公传》写作之前，北京济公传口头文学已经相当流行了。因为《评演济公传》中的济公故事少于口头济公故事，所以《评演接后续部济公传序》中才说：“阅之者不无遗珠之憾，乃复言于煮字山房主人岱坡魏君，求其完璧。遂重赏求郭小亭先生所著续本，付志石印，粲然大观。美乎备矣！”<sup>[13]</sup>由此，《评演济公传》应该是在口头济公故事基础上完成的。Meir Shaha认为：《评演济公传》和济公鼓词之间的差异暗示出后者不可能是前者的直接来源，因为小说中那些从鼓词借鉴来的叙述单元、人物和情节是经过第三者过渡而来的，而这个第三者应该就是评书。题目中“评演”二字暗示出它与北方“评书”密切相关，而评书口头故事非常有可能受到鼓词口头故事的影响。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济公传鼓词影响了济公传评书，而后者又是《评演济公传》的直接来源。同时，一些济公传鼓词故事也是京剧中备受欢迎的剧目，很可能鼓词和京剧都影响了作为《评演济公传》来源的评书。<sup>[9]</sup>

《评演济公传》中的济公故事与杭州济公故事有着根本差异，无论故事情节还是故事结构都可谓另起炉灶。《评演济公传》中主要讲述了济公作为秦相的替僧，带领几个归附于他的徒弟，其中既有出身绿林好汉的陈亮、雷鸣等，又有具有千年修行的妖怪大陀龙金风和尚，他们行侠仗义，为民解忧。济公先后率众追捕采花大盗华云龙和夺婴胎合药的妖道邵华风，平定叛乱，最后与八魔决战。从小说内容来看，存在着两个故事体系，一为侠义公案小说，二为神怪小说，这两个故事体系共同建构了《评演济公传》玄幻的故事群。《评演济公传》中纯粹的清官角色缺失，济公身兼清官与侠客二职。济公作为秦相的替僧，承领了秦相的权威，这样也就具备了“官”的条件，他可以调动官府的力量，依附于他的侠客也可以成为官。接下来，济公名言顺地率众捉拿四川江洋大盗华云龙，平定邵华风的谋反叛乱，完成了济公清官的塑造。另一方面，济公也是一位侠客，有侠义心肠，通过自己的神通除恶扬善，他多次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子弟王胜仙、秦恒、卞虎等，救人于危难之际。《评演济公传》整部作品从思想倾向来看，视国家稳定为己任，而不以反对官府为目标，这是侠义公案小说典型的思想倾向。《评演济公传》中神魔部分的描写既模仿《西游记》的叙事技巧，也参照了《封神演义》的叙事框架，虚构大量形体容貌与宗教修为各异的超现实人物，并引出元始天尊、长眉罗汉、紫霞真人等宗教领袖，构成分别以济公和邵华风为主的两大阵营，一正一邪。

清末民国济公传续书，侠义公案神怪杂糅的路数不变，但缺乏新意，艺术性也较差，往往过于直白或荒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续书的情节中出现了一些时代因素的痕迹。《二十六续济公传》第三十五中写到中国沿海百姓都犯着“失血症”，而这种瘟疫似疾病的罪魁祸首是西海洋中映其利国中的两个怪人，这影射的正是当时英国在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倾销鸦片的历史事实。在国运危亡的时刻，济公小说这种纯民间娱乐性质的作品也沾染了批判现实的意味，而济公除妖也似乎具有了销烟民族英雄的内涵。

### 三、两大济公故事群形成的原因

南宋时期杭州作为都城，经济、文化一度繁荣，陶真、话本等民间文艺形式流行。元明清三代北京成为都城，政治文化中心北移，尤其清中后期北京天桥成为民间文艺的中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济公故事由南至北传播。济公故事在杭州衰落了，却在北京蜕变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北京济公故事最早也试图照搬、借鉴杭州济公故事，济公传鼓词中就有几个情节直接来源于《醉菩提》，但评书的讲演者和小说作者郭小亭删去了这些来源于杭州的故事，所以从评书开始，济公故事与更早的杭州济公故事的联系被割断了。济公故事的根本改变与诸多因素有关。

#### 1. 地域因素

杭州是佛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地方，很多佛教高僧和佛教传说都与杭州有关。五代至宋时期，杭州塑有众多罗汉像，罗汉信仰在杭州甚为流行。《佛祖统纪》卷十六载杭州上天竺寺住持普觉法师，退任前曾梦一罗汉自天台山来，不久来自天台讲经祈雨的圆智继任住持，宾头卢果然出现，送给圆智山茶一器，当时人都认为圆智是五百罗汉之一。<sup>[14]</sup>南宋僧人济公出生在天台，一生主要活动于杭州一带，曾先后寄居于灵隐寺和净慈寺，他圆寂后因为出现舍利而被认为是高僧，进而与杭州罗汉信仰相联系被认为是罗汉。济公传说内容大都来源于高僧故事，并且得到了僧团的支持与认可。《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就

很像是一部关于济公的高僧传,济公的出生很符合佛教传统 是他母亲梦吞日光得孕而生 出生后便有高僧来为他指点出家的前途 类似的故事在高僧传中很多,济公开悟的情节与唐代慧照义玄禅师、宋代圆悟克勤禅师都很相像。清朝末年,天桥成为北方民间文艺的中心 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艺人。天桥被称为贱、脏、穷、邪之地 而天桥艺人是“被抛出的群体”或“漂泊的群体”<sup>[15]</sup>。天桥艺人可以说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来自于不同阶层和地方的流民,靠他们的“艺”取悦于平民而生存。他们没有任何统一的宗教思想 有的只是平民百姓头脑中来自于口头文学的模糊的宗教、神怪、公案侠客意识 他们需要济公故事俗、有趣而且很吸引人。《评演济公传》展现了北京天桥济公的形象,济公从一个杭州的地方性圣僧转变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平民文化中的神佛、侠客。

2 文学本身因素

宋明白话小说的规模还比较小 主要为话本和拟话本 而到了清中后期 侠义、公案、神怪杂糅的章回巨著登上白话小说舞台,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侠义小说 起源于《史记》的刺客列传,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侠义小说 而公案小说一般认为最早散见于隋 明中后期的《龙图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到了清中后期,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均出现强弩之末的状态,故事情节多是大同小异的模拟抄袭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不稳定造成民间秘密会社、起义队伍大增,这也使读者和作者都不再满足于过去公案小说单纯断案故事的老套。于是,故事将清官与一群本领更为高强的侠客变成主角,联手对付有武艺的大盗和群体的反抗者,故事变得复杂了,也好看了。同时,神怪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等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大量斗法情节和千奇百怪的法宝与法术描写 满足了世俗社会追求新奇娱乐的心态。由于宗教故事本身具有自我神化虚幻的特征,于是宗教题材的小说大受神怪小说作者的青睐。济公故事原本就是宗教题材故事,加上济公乐善好施、救人于急难的性格,济公故事被侠义、公案、神怪杂糅的小说形式选中而重新打造 出现了与前不同的北京济公故事。

3. 济公故事传播方式的改变

在杭州,济公故事最初只是一些传说 当这种口口相传的故事积累到一定数量时,便会被一些下层知识分子记录下来 如标注“仁和沈孟粹述”隆庆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很有可能是沈孟粹根据当时杭州地区口头流传的济公故事记录编纂而成。传说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可以任意增减更改,但济公传说一旦形成文本 这种灵活性就会受到限制。文字是相对固定的,因此进入文本的济公故事也会被文字固定下来,从而失去再发展的机会。另外 当济公故事进入文人阶层 文人会用他们的思想体系重新编定济公故事 将其与民众拉开距离,如《鞠头陀济颠全传》作者王梦吉有意地删去了表现济公反叛性格的情节 按照儒家传统审美观和价值观重构故事情节,导致济公故事越来越缺少生气并脱离民众。于是,杭州济公故事从传说走向文本之后,也慢慢地走向了衰落。

济公故事由南到北的传播过程中,在多因素下故事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同济公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不变的,即都体现着下层民众的期盼与心愿,济公故事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港湾。

[参 考 文 献]

[ 1 ] [宋]释居简.北磻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112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本: 159.

[ 2 ] [宋]释文素.如净和尚语录(卷下)[ M].大正藏(册 48).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31.

[ 3 ] [宋]释圆照,等.破庵和尚语录[ M]. 已续藏(册 7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218

[ 4 ] [宋]释元靖,释智能,释惟衍(编).运庵和尚语录[ M]. 已续藏(册 7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121.

[ 5 ] [明]释法林,等(辑).慧文正辩佛日普照元叟端禅师语录[ M]. 已续藏(册 7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545.

[ 6 ] [元]闽宸峰沙门照仲集.历朝释氏资鉴[ M]. 已续藏(册 7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248.

[ 7 ]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 M]. 续修四库全书(册 11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445— 446.

[ 8 ] [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余[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75 368

[ 9 ] Meir Shahar, Crazy J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1— 52 131.

[ 10 ]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 M].谭寻(补正).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8

[ 11 ] [明]郎瑛.七修类稿[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38

[ 12 ] 云游客.江湖丛谈(第三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09.

[ 13 ] 评弹通考[ M].谭正璧,谭寻(辑).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56 56.

[ 14 ] [宋]释志磐(撰).佛祖统纪(卷 16)[ 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影印本: 709

[ 15 ] 岳永逸.近代都市社会的一个底边阶级——北京天桥艺人的来源、认同与译写[ J].民俗研究,2007 (1): 101

[责任编辑:曹金钟]